

俯首甘爲孺子牛

說青銅器上的「牛」

橫眉冷對千夫指

俯首甘爲孺子牛

游國慶

這是魯迅《華蓋集》中「自嘲」詩裡的句子，下

句典出《左傳》：「鮑子曰：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？而背之也！」杜預注：「孺子，茶也，景公嘗銜繩爲牛，使茶牽之，茶頓地，故折其齒」。

長者爲孺子扮牛，供其牽繩驅使，乃至折斷牙齒，仍甘心爲之；而耕牛之供人牽繩役使、犁田負重、載貨拉車，又或作爲祭祀犧牲，以奉神明，長期與人類生活相伴相隨，其甘苦又是如何呢？

我們試從銅器上「牛」的造型與紋飾，探討「牛」，在人類的青銅文明史上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。

牛與銅器文明

農業社會之初，以人力耕作，生

產有限，後利用牛來犁田鬆土，使生產面積增大，收穫也有長足的躍進。

人們開始圈養牛群，用以耕種、用以豐收、用以載重、也用以祭祀神明；

而隨著文明禮制的發展，「牛」遂成

爲祭祀祖先神祇時，極重要的犧牲品物。

史稱「伏羲氏，教民養六畜，以充犧牲」，顯示蓄養牲畜、以奉祭祀

的來源甚早。周代禮制中以牛、羊、豬三牲爲「太牢」，是最高等級的祀

典祭品，唯天子祭神方能使用；其次

「少牢」，只有羊、豬而無牛，亦可見出「牛」在祭儀中的高規格。《周

禮·地官》有「牛人」一職，掌養國

家牛群，其實，早在商代，類似「牛人」以掌養國家牛群的職官已不在少

數，如殷墟卜辭中記商王祭祀用牛，其數量竟有一次使用一千頭之例，如





果不是蓄養衆多，絕不可能供給那麼大額的用量。

青銅時代約始於二里頭文化的夏代時期，至殷商漸盛，器類增多，器身的紋飾也加繁。常見的獸面紋、龍紋、鳳鳥紋，綉麗而多元的盤據著器身的各個部位，似乎各自肩負著祭典中溝通神靈的不同角色。

「牛」作為農業生產的重要角色，當銅器藉由動物紋飾以充神人媒介（所謂靈媒）的風氣一開，具有「牛」特徵的全器造型；「牛角」紋樣的「牛角獸面紋」、「牛頭鬚首」、「牛頭附飾」、「牛頭鋪首與銜環」等，便豐富而多樣地裝飾在商周青銅禮器的各種部位，這些「牛角」「牛頭」紋飾，往往「目無全牛」，卻生動地托附在銅器重要的承載施力部件（如尊、壺大型酒器的肩部；爵、角、罍、盃、盃、觥的提鑿上端；鬲、甗、鬲鼎的袋形足腹部；方鼎柱足的上部等），充分象徵著堅忍耐勞與持恆負重的「牛」精神。

東周以降，寫實主義的鑄造與紋

飾手法進入青銅世界，除了延續「牛頭鋪首與銜環」和「全牛」造型外，狩獵紋壺上鮮活的「鬥牛」場面，與極生活化的「牛形席鎮」，都讓人深深感受「牛」在人類世界中的角色變換。

「牛」在銅器中的各種角色與裝扮

以下我們依「牛」在銅器中的位置與形式，說明銅「牛」飾的各種角色扮演及其相應的文化時空的遞變。

一、多牛頭鑿飾與附飾

「牛」的裝飾主題在銅器中出現，一開始便是其最特殊的牛頭與牛角，在龍紋、鳳紋、獸面紋作為銅器主要紋飾的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，牛頭已分布於銅器各部位，以象徵其不同的意義。

鳳紋方座簋（中銅四六四），高二七·二、口徑二二·六公分，西周早期器。

器頸及方座上層飾短尾鳥紋，器腹及方座腹部飾直稜紋，圈足飾長尾鳥紋，方座下層飾夔紋，皆反映西周

早期的紋飾作風。器耳的造型與裝飾特殊，垂直於器耳的獸耳裝飾，耳下的長方形垂珥，使器耳造型成為全器最醒目之處；耳背面一小牛、正面三牛（一大二小）、垂珥兩面二牛，一耳六牛，左右兩耳共十二牛；與器耳配合的高聳稜脊上有一小牛，二稜則有二牛；器座平台四角飾四牛，共計十八個浮雕牛首裝飾。牛頭在鑿把之上，似表能承擔載重；在方座平台四角，則似共同背負簋體；總計十八個牛頭，似又意謂陪伴此禮器祭祀犧牲之豐盛。

類似的器耳牛面裝飾，亦見於「牛首飾四耳簋」，一九八一年陝西寶雞紙坊頭一號墓出土，四耳共二十四個牛首（《中國青銅器全集》六一—六三）；美國華盛頓弗利爾博物館藏的「乳釘四耳簋」，也是四耳二十四個牛頭（《中國青銅器全集》五一—五十五），應該都是早年於陝西寶雞出土，而後流散各處的西周早期銅器，所以才帶有如此相近的裝飾風格。可知這種多牛裝飾巨鑿的銅簋製作工



兩耳下之垂珥兩面有二牛

簋正面高聳棱脊上有一小牛



西周早期 鳳紋方座簋 中銅46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簋身兩側獸耳：耳背面一小牛、正面三牛（一大二小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器座平台上四角飾四牛



西周早期 祖乙尊 故銅2390 腹部正反面均飾巨型牛角獸面紋，雙角、雙耳鑿出器表，形象森然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藝，是西元前一千零四十年左右（西周初武王、成王時）在今天陝西寶雞市一帶（當時為周王畿範圍）所流行的一種極繁麗的銅禮器造型與紋飾，其宏富壯美的裝飾手法，儼然成爲最能代表周初開國氣象的經典時尙。

（本文關於夏商周三朝的定年，採用《夏商周斷代工程》的結論）

二、主體大牛角獸面紋

衆所周知的，商周獸面紋以半寫實、半想像的方式，構成具有眼（眉）、耳、鼻、口（牙）、角、身

（或省略）的奇特獸面紋飾，在肅穆莊嚴的祭祀場合裡，彷彿扮演著人神溝通的角色。由於是半寫實，取材自各種動物的主要特徵，所以我們從角、耳的形態，可以約略區分屬何種獸面紋。

有長而微微上揚的角，是牛角獸面紋

有長而向下、向內卷曲的角，是羊角獸面紋

有下寬、頸收、上平的瓶形角，是鹿角獸面紋（常見於盞耳上。

但龍角亦多作瓶形）

有尖錐狀上出的角，是龍角獸面紋（常見於盞耳、匝斝上）

無角而有圓大雙耳的，是虎形獸面紋

有長而收尖的耳，是兔首獸面紋（常見於盞耳上）

其他奇異變化的獸面角、耳，或作長卷鳥羽、或以彎身夔龍、或藉大家長鼻、或雜蜷曲小蛇，所有特殊紋飾都是參和各類動物的部分，再加繁複或簡化以融成。

準此，牛角獸面紋在器身主體的強烈辨識特徵，便是突出的牛角。

祖乙尊（故銅二三九〇）高三十四·五、口徑二十五·六公分，西周早期器。這是西周早期流行的大口筒狀尊，呈三段式，侈口、腹微鼓、高圈足，近地有折緣，通體四方作四道透雕扉稜。口緣外壁飾尖葉形簡化倒立夔紋，其下爲卷尾夔龍紋，腹部正反面均飾巨型牛角獸面，雙目、雙角、雙耳與嘴角獠牙均聳揚出器表，形象森然，挺立的鼻樑取代扉稜，更賦予獸面立體的威勢。腹下作二道弦紋與高圈足相隔，其下則飾曲角獸面紋，全尊莊嚴雄奇，華美富麗。銘文二行六字，紀錄某人（作器者名未鑄上）爲其祖父乙鑄作此寶貴的祭器。

與此尊形制相近，且獸角揚出器表的有成王時的「何尊」，通高三十九、口徑二十八·六公分，一九六三年陝西寶雞賈村鎮出土（《中國青銅器全集》五一—五二、《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》一百一十一頁），雖「何尊」爲羊角獸面，卻可作爲「祖



西周早期 旅祖丁甗 故銅2135 鬲部腹足飾大牛角獸面紋。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西周早期 獸面紋鼎 中銅1532 袋形腹部下有三個大牛角獸面，
三柱足上端也有牛角獸面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乙尊」鑄造時間的重要參考。

同為外揚牛角的裝飾手法則有「伯矩鬲」（高三〇・四、口徑二十二・八公分，一九七四年北京琉璃河二五一號墓出土，《中國青銅器全集》六一〇〇八）、「古作父己卣」（高三十三・二、口徑十五・七公分，上海博物館藏，《中國青銅器全集》六一九〇）、「強伯方座簋」（高三十一、口徑二十五公分，一九八一年陝西寶雞紙坊頭一號墓出土，《中國青銅器全集》六一一五八），同為西周早期早段器，均極精美，為一時銅器的首選，顯示獸角揚出器表的裝飾手法，是當時並行於東方燕國（北京琉璃河）與西方王畿附近（陝西寶雞）的工藝特色。

三、腹部上之大牛角獸面紋

與「祖乙尊」主紋相近，而牛角未揚出器表的牛角獸面紋，往往見存於鬲、甗、鬲鼎、盃的袋形腹足部，托附在器身中下部，以承載全器，象徵著堅忍耐勞的精神。當然，在原始意涵逐漸模糊、被人淡忘以後，繁飾

誇張的紋樣工藝師，便將上舉各種動物的主特徵，施諸本該為牛角的獸面紋上，於是羊角、虎頭、龍角等異形，也移植至銅器負重的袋足、柱足上部、器耳、器下腹鑿把、蓋鈕、蓋面各部位，以下所舉的鬲、甗、鬲鼎、盃的大牛角獸面紋，正是「負牛」原始意涵的遺留。

獸面紋鼎（中銅一五三二），高二十一・八、口徑十七・二公分，西周早期器。口下飾虎耳獸面，以突起扉棱作鼻，軀體蜿蜒回鉤，又似側身的兩龍相併。下以三個大牛角獸面紋分別托起三袋形腹部，眉目耳口與大牛角均極清晰精美。三柱足上端也以牛角獸面紋包飾，下加二道弦紋。同形式紋樣的銅鬲鼎有「父丙鼎」（高二十五・六、口徑二〇・四公分），北京琉璃河二五三號墓出土，一起出土的尚有鬲鼎、圜方鼎、圜簋等器，其年代約為西周早期成康時（參《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》二十三頁），則本獸面紋鼎亦當屬西周早期早段器。這種造型紋飾的時尚，也是



出現在西周初期的西方王畿（陝西寶雞）與東方的燕國（北京琉璃河）。

旅祖丁甗（故銅二二三五），高一·四、口徑二六·八公分，侈口立耳，三足略作蹄形。甗部口沿下飾展體式羽脊虎頭紋一周。鬲部腹足上飾大牛角獸面紋。腹內壁鑄銘文一行三字：「且（祖）丁·旅」。形制、紋飾與一九七四年北京琉璃河二五三號西周墓出土之「圜甗」（高四十一、口徑二十五·五公分，《中國青銅器全集》六一十）相似，唯「圜甗」耳作絢狀，此甗則作平素，但仍應同屬西周早期早段鑄器。在銅甗鬲部裝飾大牛角獸面紋是商晚期中段至西周中期的流行，於河南安陽小屯、甘肅靈台白草坡、北京琉璃河、長安普渡村等地，都有它出土的紀錄。或許因為鬲部袋足上端特別寬闊，最適合牛角的伸展，且能撐起厚重的甗部，在視覺上營造穩定堅實的感受，所以這樣的裝飾手法一出，便被各地工藝師競相仿效而傳播多方，成為商晚期到西周早期約兩百年間（西元前一千一



甗上飾牛頭



腹飾大牛角獸面紋



商晚期至西周早期 寧戈父丁盃 故銅185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商晚期 父癸爵 故銅2295 騰62-19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百至前九百年) 最為盛行的銅甗足部裝飾設計。

宁戈父丁盃(故銅一八五九), 高二十八、口徑十一·八, 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早段器。腹飾大牛角獸面紋, 鑿上飾牛頭, 三足略呈蹄形。其蓋內與鑿下有「宁戈父丁」銘文, 「宁戈」為族徽, 象貯藏兵戈之形。此盃形制與一九七四年北京琉璃河二五三號西周墓之「父辛盃」(高二十七·四、口徑十二公分, 《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》一四七頁) 相近。

前書稱「此器形制、紋飾與商代晚期近似, 為西周早期器」。故宁戈父丁盃當為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早段器。

四、器鑿上端牛頭飾

爵、角、罍、盃、觥等器的提鑿, 是提舉施力的主要部位。器鑿上端飾牛頭, 也有承載、負重, 象徵堅忍耐勞的精神。從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晚期的酒器(尤其是爵、角, 數量特多) 提鑿上端, 都不乏「牛頭飾」的生動形象。以下我們依器類的不同, 選取故宮院藏爵、角、罍、觥、盃各乙件

為例, 嘗鼎一臠、以饗讀者。

父癸爵(故銅二二九五; 騰六二·197), 通高二〇·二、寬十七·九公分, 商晚期器。提鑿上端作牛首形, 柱頂作渦紋, 腹飾雲雷紋飾地的簡目獸面紋, 鑿下銘文一行三字。安陽殷墟所出商晚期牛首鑿銅爵甚多, 可以參比。爵始出現於二里頭文化三期(約當夏代晚期), 一直延續發展至西周晚期, 鑿上加獸首裝飾的風氣興起於商晚期中段, 在商末到西周初、早期最為盛行, 其鑿上的獸首, 以雙角上揚的牛角形最普遍, 是當時約兩百年間(西元前一千一百至前九百年) 銅爵造型的流行時尚。

父己冊角(中銅九四), 通高二一·五、寬十五·九公分, 商晚期器。鑿上作牛首形, 口下與腹部飾雲雷紋飾地的簡目獸面紋, 鑿下銘文一行三字「父己·冊」, 「冊」為族徽銘文。角的出現比爵晚, 在二里岡上層期(商前期後段) 才見到它的蹤影, 也是盛行於商末到西周早期, 鑿上的牛角獸首, 驗證著當時的時尚流



行。

析子孫罍（故銅一八六七；麗七五九），通高三十四·二、口徑二〇·一公分，商晚期器。提鑿上端作牛首形，柱頂飾渦紋，頸飾二道弦紋。鑿下族徽銘文，舊釋「析子孫」三字，近人釋為「舉」字。銅罍始出現於二里頭文化四期（約當夏代末期），一直延續發展至西周中期，鑿上加牛角形獸首裝飾的風氣興起於商晚期，到西周早期最為盛行，與銅爵牛角鑿造型的流行時間相近，是約莫



商晚期 父己卣角 中銅9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西元前一千一百至前九百年時銅器鑿飾的一種時尚。

父辛觥（故銅一八二七；雨八〇六），通高十八·五、寬二三·六公分，西周早期器。口沿下飾兩頭相背的顧首夔紋一道，下飾弦紋一道，圈足飾以突棱界格的相向長尾鳥紋，提鑿上端作牛首形，角紋清晰、神采奕奕。鑿下銘文二行六字。銅觥主要流行於商晚期至西周早期，有蓋，作虎頭龍角或大卷羊角形，本器之蓋原缺。

蟠龍獸面紋盃（故銅二三八〇），高五十七·六、口徑十四公分，西周早期器。盃，是用來調和兩種酒的器皿，作為祭祀祖先之禮器，但在考古發掘中，常見盃與盤成組出土，表示盃也可代替匜，作為水器使用。此器造形奇特，氣勢雄偉，蓋鈕作立體盤龍，龍身盤繞。器腹作四等分鼓凸似袋狀；腹部前端有一管狀流嘴，後為一牛首鑿，腹下四柱足微外敞支立，典雅厚重。全身滿佈紋飾，腹部作四幅有角獸面，只眼珠、鼻頭及耳微凸。流嘴飾「夔龍紋」，頸部飾獸紋，足部作蟬紋，通體淺浮雕，細緻精美。

五、肩飾牛頭與牛首銜環

尊、壘等大型酒器肩部突起的牛首，是銅器上各種牛頭裝飾的鼻祖。屬於二里岡上層文化期（商早期後段，或訂為商中期）至殷墟一期間的許多考古發掘，充分驗證了這一點（如鄭州向陽食品廠所出尊、壘）。因尊、壘較大，需於肩部加支點，俾便傾倒酒漿時托固。至商晚期，大型酒



商晚期 析子孫壺 故銅 1867 麗75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西周早期 父辛觥 故銅 1827 雨80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西周早期 蟠龍獸面紋盃 故銅2380 高57.6公分 口徑14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器的肩飾獸首愈加普遍，銅尊上除了牛首高浮雕飾外（安陽小屯三三一號墓與十八號墓出土的獸面紋尊），鳥首立雕飾（如「婦好方尊」、鹿頭立雕飾、象首立雕飾（如「亞醜方尊」）屢見不鮮；在銅壺的雙肩，則往往飾以牛首加銜環，中下腹又加飾高突的立雕牛頭，方便傾酒將盡時的提舉，

把牛的負重功能表露無遺。自此以後，牛首銜環的主題成為許多銅酒器提環的重要設計，也影響了水器（如鑑、盆等）。

隨著時空變化，牛形鋪首也有不同的樣態，經西周、春秋、戰國，以迄兩漢，我們藉由酒器的尊、壺、缶、壺、鈇、鍾的獸首銜環，可以了解牛角獸面形式的歷史演化。

獸面紋尊（中銅八七二：JW2089），高二十三·五、口徑二十一·五公分，商早期器（二里岡上層文化期）。敞口、束頸、斜肩上飾三個高突的立雕牛頭，下飾雙目突起獸面紋，高圈足。造型、紋飾與一九八二年河南鄭州向陽食品廠出土的獸面紋尊相近（高三十·五、口徑二十八公分，《中國青銅器全集》一一一〇六），為牛頭裝飾最早出現的例證。

獸面紋尊（中銅一七六二：JW2874），高二十二·九、口徑二十二·六公分，商晚期器。大敞口、束頸，斜折肩上下飾鉤喙卷尾鳥紋、間



商早期 獸面紋尊 中銅872 斜肩上飾三個高突的立雕牛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商晚期 獸面紋尊 中銅1762 斜肩上飾三個高突的立雕牛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商晚期圓渦紋壺 中銅52 兩側提耳為牛獸首銜環 下腹部飾有高突的立雕牛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飾三個高突的立雕牛頭，腹飾雙目突起的獸面紋，高圈足外敞。造型、紋飾與湖南博物館所藏商晚期的獸面紋尊相近（高二十二·五、口徑二十二·七公分，《中國青銅器全集》四一一七）。

圓渦紋壺（中銅五二：1197），高四十一·八、口徑十八公



春秋中期 國差譚 中銅593 折肩下分飾四個牛首銜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分，商晚期器。頸飾弦紋二道，肩飾圓渦紋六，兩側提耳為牛獸首銜環，正面下腹部飾有高突的立雕牛頭，方便傾酒時的提舉。安陽出土不少類似的圓壺，一九八四年戚家莊東二六九號墓出土的「爰壺」（高三八·六、口徑十六·九公分，《中國青銅器全集》三一八三）與此最為接近，是商



戰國早期 蟠龍紋壺 中銅1483 鋪首上的牛首銜環，是前代銅壺肩飾風尚的承襲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晚期中段偏早的典型鑄器。

國差鑄（中銅五九三：JW 1792）高三十四·六、口徑二十四·六公分，春秋中期偏晚時器。直口平沿，斜肩上鑄有銘文十行五十二字，記「國差立事歲」，即齊國國佐執政之時（西元前五九九至前五七三年），由工師疑鑄造獻給齊侯。折肩下分飾四個牛首銜環，器體寬博厚重，可以想見傾倒、提舉時，銜環牛首所承受的極大重力。

鑄（𠂔）是春秋時期東方齊國一種酒器的專名，它的造型來源於商、西周盛行的圓「壺」與西周晚期新出現的「鑄」，東周時中原地區延續了圓壺（洛陽中州路四號墓出土春秋中期圓壺）和「鑄」（河南潢川上油岡老李店磨盤山出土春秋早期之際的「伯亞臣鑄」）的造型，在東方齊國也採用了相類的酒器型制，卻於銘文的自名中另起了一個地方性的專稱：「鑄」，當周王政權衰敝、諸侯競起的東周時期，不僅漸漸趨於「文字異形、言語異聲、車涂異軌」，連銅器



戰國早期蟠虺紋壺 中銅830 左右為牛鋪首銜環，是戰國早期承繼前代高突的獸首銜環後，創造出的時尚新形式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戰國早期狩獵紋鈎 故銅2372 左右為牛鋪首銜環，承襲銅方壺的肩飾風尚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的器名稱謂都清楚呈顯了這樣的時代性。

蟠龍紋壺（中銅一四八三；JW1579）高三〇·九、口徑十四·三公分，戰國早期器。圓腹壺早見於西周早期，形體修長、窄長腹，雙耳；西周晚期出現圓鼓大腹壺，兩個高突醒目的獸首銜環，盛行至春秋；戰國早期興起鋪首式獸首銜環，圓腹的最大徑也上移，器身紋飾多以圓凹線區隔作分層帶狀，鋪首上的牛首銜環，儼然是前代銅疊肩飾風尚的承襲。

狩獵紋鈎（故銅二三七二；呂二二八），高四十五·二、口徑十一·七公分，戰國早期器。方形腹壺始見於戰國早期，通行至西漢，西漢時有自名「鈎」的方壺（漢元始四年鈎銘：「銅鈎容六升重廿九斤」，見《陶齋吉金錄》卷六：十一）。本器紋飾二段，上為燕禮圖，下為狩獵紋的蒐禮圖，左右為牛鋪首銜環，承襲了前代銅方壺的肩飾風尚。

蟠虺紋壺（中銅八三〇；JW



西漢 南皮侯家鍾 中銅1320 此鍾左右的鋪首銜環已是牛首的變形，混雜了歧角、獠牙，別出新格的異獸樣貌，是一種時代的新風格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2028) 高三四·一、口徑九·五公分，戰國早期器。壺身以圓凹線區隔作分層帶狀，左右為牛鋪首銜環，是戰國早期銅圓壺、銅釭在承繼前代高突的獸首銜環後，創造出新時尚的提環形式。

南皮侯家鍾（中銅一三二〇；[W2906] 高四十五·八、口徑十九公分，西漢器。器身樸素無紋，只以三道寬帶環繞，銘文三段，在腹上：一段十四字、一段七字、另一段殘泐，可辨者七字。圓壺自名為「鍾」，始見於戰國晚期魏國的「安邑下官鍾」（一九六六年咸陽塔兒坡秦墓出土），漢人承之，遂成爲圓壺的通稱。此鍾左右的鋪首銜環已是牛首的變形，混雜了歧角、獠牙，別出新格的異獸樣貌，說明傳統銅壺的「牛角」鋪首，在西漢銅器愈加生活化趨勢下的轉變：用更繁複錯雜的動物形象和雕飾手法，對應平素的器身，這也是一種時代的新風格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